

国内全员贡献保证供应 穿越漫长封锁线送粮到前线

粮食供应

机构名称
粮食管理总局
成立时间
1950年10月
机构名称
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
成立时间
1952年9月

提示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过一部著名的电影《平原游击队》,整部电影只围绕一个主题——粮食。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粮食在一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保证前线的军粮供应,全国军民想出了很多解决办法。在无比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志愿军战士用坚定的信念和毅力挺过难熬的饥饿,后勤部队发挥聪明才智,穿越漫长补给线,将粮食送到志愿军战士手中。

全民总动员向前线供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财政部没有粮食处。1950年10月,粮食管理总局正式成立。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成立。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当时的粮食战线面临着两项重大任务:一是保证前线的军粮供应。二是稳定国内粮食市场。全国上下把保证前线军粮供应作为中心任务。

志愿军的粮油供应完全由国内组织供应,马料(主要是豆粕)、高粱和食用油由东北大区粮食总局负责组织供应,大米和面粉由中央在关内统一安排调拨,主要从华东、中南两大区组织专项加工调拨。

但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军粮的运输和加工方面都面临很大困难。

据资料显示,东北人民为志愿军贡献了大量粮食,尤其是辽宁人民贡献突出,共献出粮食356.56万吨。

为了改善志愿军细粮供应,国家还采取了用东北粗粮换回关内细粮再护送到前线

的方法。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结束后,我军专门成立了驻东北运粮办事处,授权东北粮食总局负责领导。

1952年,中央粮食部曾先后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明确了粮食工作的方针任务,保证军需民食,稳定市场价格。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是研究辽宁抗美援朝运动史的专家,他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辽宁各地大力开展了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逐年增加,农民丰收后不忘国家,踊跃地交纳公粮,用自己实际行动支援了志愿军,展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

卢骅向记者详细解释,当时的辽宁、辽西两个省连年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计划。在交纳爱国公粮中,农民一致将家中的好粮、一等粮交出来,争先恐后地挑大穗交,争取提前完成交纳公粮的任务。

1951年,据29个市县的统计,农民向国家交售余粮40万吨,超过原计划的6.9%。

在交纳爱国公粮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辽宁省的李永和就是其中之一。

李永和是一名志愿军指战员,秋收后,他给父亲写信,动员父亲把余粮卖给国家。当时,李永和的父亲原本打算把余粮卖给一个倒卖粮食的亲戚,收到儿子从部队寄来的书信后,老人毫不犹豫地把1000公斤粮食卖给了当地的合作社,后来又追加了500公斤。

这段故事被创作为山东快书《再加一千斤》,当时广为流传。辽宁各地都掀起了积极交售公粮的热潮。

同时,辽宁各地还响应国家号召,在农村,为了增产,农民搞农业生产,发展深耕细作,一些人还积极发展家庭副业,通过养猪、养鸡、采蘑菇等方式,增产与捐赠同时进行,极大地支援了志愿军粮食供应。



艰苦卓绝的运粮大作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举国之力筹集来的粮食却很难运送到前线。

志愿军老战士马世勋曾是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四大站十一分站的一名物资调剂员,当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兵站调拨物资。他告诉记者,战争年代国内的粮食运输到前线,一般先由国家粮食部门负责运送到集结地点,装上火车,待时过轨(过鸭绿江桥)。“当时有几十个物资集散地用以存放后方运来的粮食。这些粮食大多

是大米、白面、高粱米等,但是这些物资集散地经常会遭到敌机轰炸。”

1951年4月,马世勋所在的物资集散地——朝鲜三登遭敌军轰炸,损失了287万斤炒米炒面、33万斤豆油、19万双军鞋。“白天我们几乎不能动,晚上才能出来搬运粮食。”马世勋说。在战争初期,我军没有制空权,大量粮食损失在路上。在运动战期间,我军运送过鸭绿江的粮食有19万吨,完成前运计划的110.9%,但大多数

没有运送到前线战士手中。马世勋说,最紧张的时候,粮食和弹药的补给量只达到需求量的25%。

“一方面敌机狂轰滥炸,一方面我们运输车辆太少,导致粮食前运面临困难。”马世勋说,当时敌人一个军有近7000台汽车,而我们一个军只有100多辆汽车。因为种种原因,也很难缴获敌人的供给,“敌人的物资不是汽车运就是空投,我们很难从他们那获得物资补给。”

用衣服给伤员换大米

粮三天,一个负责运送伤员的担架兵用自己的衣服跟当地百姓换来点大米,给伤员吃。”

到第二次战役时,平均每天每人主副食不到1公斤。到第三次战役,因为战线太长,我军整个供应线形成前面空虚、中间脱节的状态。“到三七线附近时,运输线已经长达500公里。”马世勋告诉记者。

即使这样,志愿军战士依然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当时流行一句话‘小米加步枪,粮食在前方’,很多志愿军战士想方设法自己解决粮食困难。”马世勋告诉记者。

虽然后期有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

吃的问题,但营养单一,吃炒面也不是长久之计,“炒面水分少,总吃会上火。当时很多战士就得了口角炎,而且炒面吃多了会腹胀。”马世勋说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志愿军想出许多办法。

除了加强防空,成立筹粮队,志愿军还印发了“野菜图谱”,号召大家一起挖野菜,就地种植蔬菜,自己加工副食。1951年5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给养物资供应体制和方法都发生重大改变,“跟进式和开设供应站的保障方法被摒弃了,改为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建设兵站运输网,给部队发补给也是按照部队实

力、标准、作战要求、地理条件、部队现有库存等发放。”

随着补给制度的改善,给养供应也逐渐好转。到1952年,粮食等物资不仅可以及时按标准供应,而且还有结余可以储备。马世勋说:“那时候前线坑道里经常存着五六个月的粮食。有时候还能有余粮发给当地老百姓。为了让战士吃上鸡蛋,后方还将鸡蛋加工成粉,装在罐头盒运到前线,战士们用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到1952年,全军粮食储备已达8个月以上;到1953年2月底,全军共储备粮食24.8万吨。

为解决粮食问题立大功的“筹粮队”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前线粮食紧缺,许多部队成立了筹粮队。抗美援朝老战士宁殿云当年曾担任过50军105师49团筹粮队的队长。

“我是团部宣传员,因为粮食紧缺,部队成立筹粮工作队,任命我做队长。”宁殿云说,每支筹粮队由二十几个战士组成。“我们主要负责去当地老百姓那儿筹粮。”当时部队有严格规定,不能动老百姓其他东西。

“志愿军党委发布了《借粮规定办法》,要求我们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借粮。”宁殿云告诉记者,当时还统一划分了借粮区域,这也是为了避免因地区贫富和远近不同,部队筹借粮食数量不一而产生混乱,加重群众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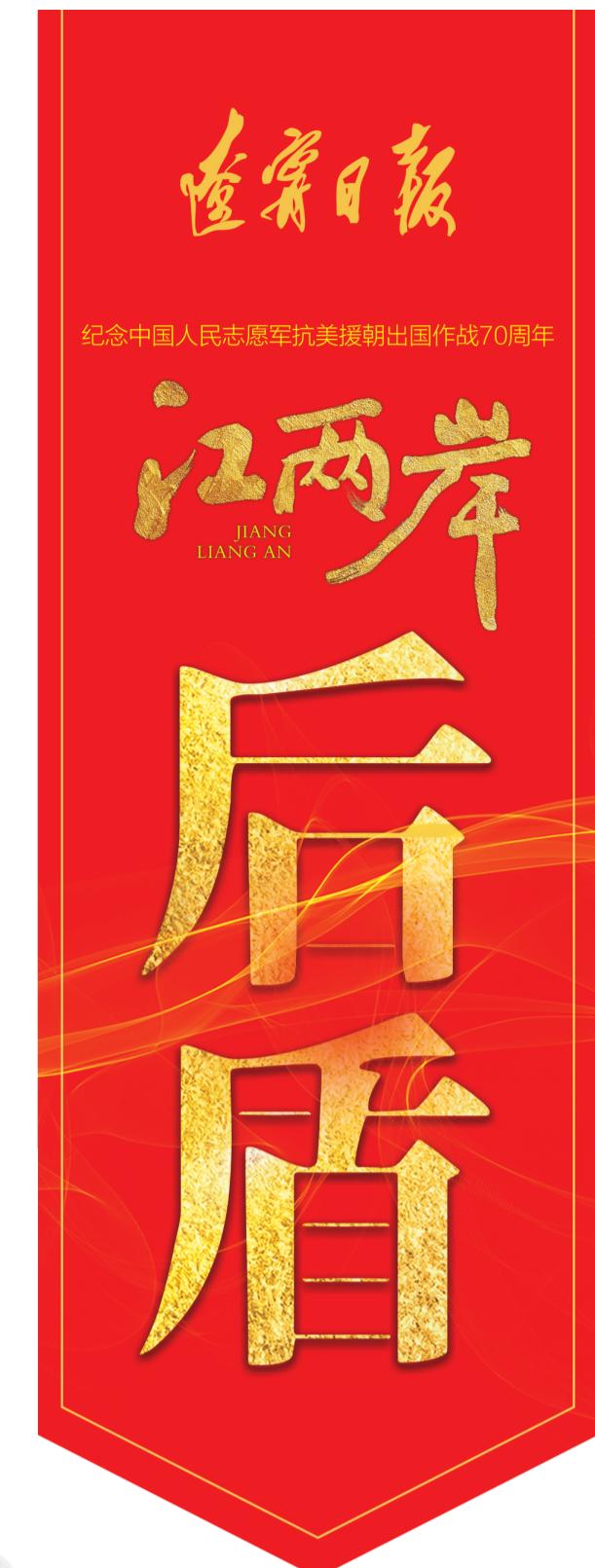
宁殿云的主要任务就是每天和一两个战士去百姓家借粮,“朝鲜粮食产量本来就不高,加上当时战争破坏,筹粮工作

困难重重。”

筹粮队筹到粮食后,要把盖有公章的借据付给借粮百姓,以此向政府抵交公粮。“刚开始一些当地老百姓不理解,借粮面临很大困难。后来就好很多了,很多百姓甚至主动把粮食借给我们。”宁殿云说。

这种就地筹粮的做法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起到了巨大作用。前三次战役期间,就地筹借的粮食占部队总消耗量的七成以

上。整个运动战期间,我军共就地借粮12172.5万公斤,其中,38军从1950年10月入朝至1951年2月的4个月中,借粮占供应量的80%。1951年朝鲜发生特大洪水,交通中断,粮食再度告急,经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向朝鲜政府筹借粮食5800多万公斤,基本保证了供应。志愿军两次向朝鲜政府和人民筹借粮食18004万公斤,到1953年5月,已分期分批还清。



T09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赵雪
视觉设计 隋文峰



粮食一直是战争最重要的后勤保障。筹粮队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受访的志愿军老战士有的已经无法站立,有的说话很吃力,但每每提到在前线筹粮的经历,他们的眼睛里都放出异样的光芒。那段经历对于他们来说刻骨铭心。正如一位志愿军老战士所说,等到的每一粒粮食,都无比珍贵,它们汇聚在一起,凝聚成一种力量,引领志愿军战士义无反顾地奔向胜利。

(图为记者采访志愿军物资调剂员马世勋)

词条

交纳公粮

抗美援朝时期,辽宁通过大力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逐年增加。

● 1950年

辽东、辽西两省农业总产值13.23亿元,粮食总产量513.5万吨,全面超过1943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 1951年

辽宁省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提高16.6%。

● 1952年

辽东、辽西两省粮食总产量达544万吨,比1951年增长14.99%。

超额完成

辽东、辽西两省连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计划。1951年,据29个县市统计,农民向国家交售余粮近40万吨,超过原计划6.9%。